

■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研究

##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房玉柱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关键词:**小人;中国政治文化;符号;私德;公德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0)05-0128-05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0.05.021

## The Evolution of the “Villain” in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bols

Fang Yu-zhu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Abstract:** The “Villain”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is often opposed to the “gentleman”. In the pre-Qin period, it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the position to the morality and became the standard of the social evaluation and the aesthetic evaluation.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ountry was strong without attacking the villains. Both the disaster of Danggu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fractional struggle of Niu and Li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were caused by the fractional struggle resulted from the fierce debate between the gentlemen and the villains, which led to decline of the country. During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great attacks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villai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several party disputes, such as Qingli party dispute, Yuanyou party dispute, Caijing’s persecution of the new party and Qingyuan party ban, which we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Song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began a fierce debate between the gentlemen and the villains around the great etiquette, which affecte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Donglin Party and the eunuch par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ccelerated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 In fact, i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he villain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dissident.

**Key words:** the villain;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e; Symbols; Private virtue; Public virtue

“小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和“君子”相对举的一个概念,最初主要是从地位而言,后来指道德低下的人,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小人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成为中国政

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小人”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特有的符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现将“小人”的含义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变化更迭梳理如下。

收稿日期:2020-01-02;修回日期:2020-02-07

作者简介:房玉柱,男,陕西商洛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 一、先秦时期小人含义的变化——由位变德

在西周时期,“小人”主要指的是小民。“小人”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当中,《周易·解卦》中说:“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sup>[1]310</sup>意思是说,六五君子能够舒解危难,吉祥,甚至能用诚信之德感化小人。这里的君子就是奴隶主,而小人则是奴隶。周振甫先生对于这段话的解释是这样的:“贵族把他捆绑了又解开,俘虏成为奴隶。”<sup>[2]140</sup>周先生把“孚”解释为“战俘、俘虏”有些不妥,但是认识到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在于位,是有一定见地的。《尚书·康诰》中说:“天畏棗忱,民情大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sup>[3]260</sup>《尚书·无逸》中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sup>[3]314</sup>《诗经》中说:“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属。”<sup>[4]388</sup>在这里,“小人”主要指的是地位低下的老百姓,“君子”主要指的是统治者,是贵族。“君子”就是“君主之子”的意思,这里的“君子”和“小人”主要是从位的角度而言的。西周在政治文化中,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里的“民”就是“小人”。

西周后期,特别是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有一些贵族就沦为平民,但他们拥有文化,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因此这类人也可称为“君子”。还有一些社会下层的平民,通过接受文化教育,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可由“小人”变为“君子”,例如的孔子的一些弟子就是这样。这样,君子和小人之间是相互流通的。即“君子”可变为“小人”,“小人”可变为“君子”,其区别标准在于“德”,而不在于“位”,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从由“位”划分“君子”和“小人”到由“德”来划分“君子”和“小人”的转变。这类含义主要见于《论语》和《孟子》当中,例如,《论语》中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sup>[5]38</sup>“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sup>[5]39</sup>用义和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在位者,小人指的是庶民,但已经有了德的区分,君子重德,小人重视利。孔子告诫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sup>[5]59</sup>那么君子式的儒者和小人式的儒者是如何区分的呢?君子式的儒者谋道,小人式的儒者谋食。君子式的儒者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小人式的儒者只是为了追求生存,二者境界不同。《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其君子实玄黄于

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浅而已。”<sup>[6]135</sup>这里描述的是周朝初年东征攸国的情况,这里的小人主要指的是下层百姓和士兵。《孟子·离娄上》中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sup>[6]135</sup>在这里,君子指的是官吏,即统治者,小人指的是百姓。《孟子·滕文公下》又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sup>[6]135</sup>这是王良对赵简子说的话,王良是善于驾车的人,赵简子想让王良替自己的宠幸小臣奚驾车,王良不肯,说自己不习惯于替小人来驾车,因为替奚依规矩驾车,整天打不着一只猎物,而违背规矩驾车,一早晨便打了十只。这里的小人指的是赵简子的宠幸小臣奚,含有德和位双重含义,指的是道德败坏、地位低下的人物。可见,从孔子和孟子开始,小人被赋予了道德含义。

到了战国时期,在庄子、韩非子和荀子的著作中也有对小人的论述。在《庄子》中,小人具有了审美评判的含义,“君子”是大众文化审美批判的正面,“小人”则是反面,《庄子·大宗师》说:“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sup>[7]273</sup>庄子追求的是“畸人”之美,是具有个性的人。在《韩非子》的著作中,韩非以“君子”和“小人”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韩非子·用人》中说:“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sup>[8]206</sup>在用人方面,君主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对君子和小人一块儿赏罚。《荀子》中的小人则是其教育的对象,《荀子》中说:“小人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sup>[9]44</sup>这样的小人必然令人厌恶。屈原一曲《离骚》发天地之悠悠,表现了对小人的憎恶,用小人代指政治上的恶人,是和屈原政治观点不同的一群人。王逸的《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sup>[10]9-11</sup>屈原创用香草美人来比喻君子,用恶禽臭物来比喻小人,这里的小人是指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怀王的宠妃郑袖等人,他们主张联秦抗齐,而屈原主张联齐抗秦,子兰、靳尚、郑袖收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陷害屈原,导致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这些小人,道德败坏,为了追求一己私利,陷害忠良。屈原的境况引

起了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同情和共鸣。从屈原开始,小人具有了政治文化的含义。

可见,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从由“位”来区分变为以“德”来区分的过程,谦谦君子是既有位,又有德,而小人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制的解体,许多贵族沦为小民,而地位低下的小民则通过受教育而成为君子,这样就出现了位德并重的局面,在庄子和韩非的著作中,“君子”和“小人”被赋予了审美评判和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在荀子的著作中,“小人”则成了教育的对象。到了屈原,则以“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用“恶禽臭物”来比喻小人,小人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的含义。

## 二、汉唐时期不攻小人

汉承秦制,秦朝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汉代则是阳儒阴法,表面上独尊儒术,采取文化专制,实际上采用的是法家的一套思想,汉武帝屡兴大狱,使用张汤等酷吏镇压人民。西汉是由一批白衣卿相所建立的国家。刘邦是泗水亭长,萧何、曹参都是沛县刀笔小吏,樊哙是屠狗之辈,夏侯婴是车夫,周勃是个吹鼓手,韩信讨过饭,曾受胯下之辱。他们这些人均来自社会下层,属于小民,自然对“小人”多了一层了解,因此,在治国方略上,不拘出身,大胆使用人才。特别是汉武帝,大胆使用卫青、霍去病、桑弘羊、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来自社会下层的“小民”,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基础。这里的“小人”主要指的是来自社会下层、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建立的国家,光武帝刘秀虽然属于皇室后裔,但他们这支是属于远支旁庶的一脉,和平民已经无异,刘秀主要依靠一支叫做“铜马”的农民军取得帝位,因此,刘秀又被称做“铜马帝”。豪强地主崇尚门第和出身,拥有自己的庄园经济和武装。但客观上豪强地主也崇尚名节,梦想成为谦谦君子,文人更是如此。东汉末年出现了党锢之祸,以李膺为代表的士人集团联合外戚势力,反对宦官专权,这是汉代君子和小人斗争的表现,以李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和外亲戚集团相对清廉,属于君子,而以宦官为代表的势力是小人,最终以士人党被诛杀殆尽而结束,由此也导致了黄巾起义和东汉的灭亡。有鉴于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

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前汉指的是西汉,西汉不是远小人,主要是使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小民,使得国家得以兴盛。后汉,指的是东汉,宦官、外戚轮流专权,朝政黑暗,而党锢之祸恰好发生于东汉桓帝、灵帝之时。在这里,诸葛亮,将“小人”和“贤臣”对举,“小人”主要指的是宦官势力,他们是政治上的恶势力,这些人身居高位,道德败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世,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明显,朝廷选拔人才使用九品中正制,重视出身门第,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局面。到了唐代,天下一统,国家兴旺昌盛,唐初统治者更是胸怀宽广,儒释道三教并行,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唐朝的朝廷上表演“胡旋舞”。唐朝是由关陇贵族建立的政权,一方面延续了门阀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的实行,给予大量小民以晋升的机会,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到了唐末,出现了牛李党争,以科举出身的牛党和以世族出身的李党发生了矛盾,导致了国家的衰弱。可见,唐代给予了“小人”以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汉代和唐代给予“小人”一定的发展空间,才保持了国家的强大,汉唐开拓进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与之不无关系。西汉统治者,出身下层,重视小民,汉武帝则大量使用小民。东汉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世家出身的知识分子重视名节,由此产生了党锢之祸,而动摇了汉代的国本。而唐代统治者由于实行了科举制,使得大量小民可以参与朝政,从而为统治者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汉唐盛世是讲究事功的时代,重视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对于其出身、地位不是很重视,不攻小人,从而造就了汉唐盛世。

## 三、宋明时期——君子、小人激变的时代

宋代诸儒以回到三代作为其理想追求。在宋代,文人的地位极高,他们成了统治者惟一合作的对象。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力建立国家,但他相信文臣,不相信武将,终宋之世,文人很少遭遇刀劈之祸。由此也造就了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up>[1]</sup>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佛老思想的盛行,儒家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整合儒家思想,他们“出入佛老,返于六经”。由

唐代韩愈开启的排斥佛家思想,尊重儒家道统的运动开始蔓延,宋代继承了这一思想运动,直至到了朱熹则建立起可与佛老两家相抗衡的理学,这时君子与小人之辩愈演愈烈,在政治实践中还夹杂着党争。

宋代党争频繁,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千年一遇激发了知识分子们的豪情,由于太祖定制:“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sup>[12]</sup>,因此,这些文人士大夫既是权力的主体,也是话语的主体,他们是真正的国家精英,思想空前活跃。但另一方面却引起了党争,这些党争虽未造成文人被杀,但也伤了国家的元气。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在这里就奠定了以君子和小人来划分朋党,君子以同道为朋党,小人以同利为朋党。宋代的党争有四次高潮: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文人士大夫以意气为重,政治观点不同而结成了朋党,互相指责对方为小人,给宋代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北宋,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现了三个朋党:以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代表的洛党,以苏轼、吕陶等为代表的蜀党,以刘摯、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为代表的朔党。这三个朋党可谓是君子党,都是士人君子,因为学术和政治观点不同而互相攻伐,特别是蜀党和洛党之间势同水火,一直蔓延到北宋灭亡。到了南宋,朱熹推崇理学,由于在赵汝愚和韩侂胄的斗争中支持赵汝愚,和韩侂胄发生冲突,而成为伪学党首,差点送命,这就是庆元党禁。“元佑党争”和“庆元党禁”,一个在南宋,一个在北宋,反映了当时党争的激烈局面。在这里,“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是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的人的称呼。宋代的灭亡和积弱,与以攻小人名义发起的党争不无关系。

明代建国以后,推崇理学,出现了思想文化专制,加强了厂卫特务机构的建设,对人民的控制力加强。明代的君子、小人之辩主要表现在嘉靖时期,围绕要不要给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献王是加封号和迁陵而出现了礼部官员和支持改制的官员之间的争辩,从而使明代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左顺门事件使嘉靖皇帝大权独揽,小人竞相进言得以升迁。明末,由于宦官专权,出现了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争,东林党以“天下”为己任,对宦官集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明代的君子、小人之辩异常激烈,轻则被罚俸,重则被放逐、治罪,甚至杀头。可见,在明代,君

子、小人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符号,指斥为对方为小人,而自命为君子,且异常残酷。

综上所述,由于宋、明两代攻击小人,致使其国力受损,明代虽然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但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小人成了一种政治符号,成了对持不同政见者攻击的利器。

#### 四、小人——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汉唐不攻小人,所以国家强盛。而宋明对不同政见者以小人的名义大加攻伐,从而造成了国家力量的削弱,给予一部分人党同伐异制造了借口。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sup>[13]</sup>君子是有德有位之人,小人是无德无位之人。在理论上,这样的分野是明显的,在现实中,特别是在道德践履中,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楚,“道”和“朋”的界限也难以厘清。即使宋代的君子党之间也以“小人”称呼对方,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小人就是与自己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的代名词。

道德有私德和公德之分,即李泽厚所认为的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宗教性道德,即私德,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人们努力的方向。李泽厚说:“Kant和一切宗教,也包括中国的儒家传统,都完全相信并竭力论证着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超越人类总体的天意、上帝或理性,正是它们制定了人类(当然更包括个体)所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或伦理规则。……这就是所谓绝对主义伦理学,也就是我所谓的‘宗教性的道德’。”<sup>[13]</sup>这些道德经常以“神意”、“天道”、“真理”或“历史必然性”的绝对形式出现,通常把个体价值、人生意义放在这个绝对命令之下。而社会性道德,即公德,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状态,是约束人际交往的规范。李泽厚认为:“所谓‘现代的社会性道德’,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行为活动中所应遵循的自觉原则和标准。”<sup>[13]</sup>社会性道德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宗教、伦理三合一的社会。现代社会性道德以个体为基础,主张个体第一,群体第二。私利第一,公益第二,强调个人权利和个性。现代社会性道德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现代经济体制的特征,具有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始终处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公德无处不在。这样看来,国家强盛、政治清

明是社会性道德,是公德,是大义。而真诚、守信、不背叛是私德,属于宗教性道德。在当前中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离契约社会还有距离,人们还强调私德,实质上公德是缺位的,表现在现实中更多的是强调私人感情,重视人际关系。有的人,往往是成小义,而失大节。在这里,江湖义气是小义,是私德,而国家至上、法律至上、集体至上是公德。忠于某个人是私德,忠于国家和法律则是公德。公德和私德的矛盾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是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冲突。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小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是打压政敌的借口,在道德实践中,君子可能体现了私德,甚至沦为乡愿,而小人在道德践履中则体现了公德,社会要发展,必须重视公德,给予“小人”以发展空间。

### 结语

在先秦时期,“小人”开始指的是地位低下的人,后来具有了道德含义,以致发展为审美评判和社会评判的标准。汉唐不攻小人,给予“小人”以一定的空间,这是消极自由<sup>①</sup>的表现,所以国家强大。而宋明攻小人,所以给党同伐异制造了借口,使得国家元气大伤,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佑党争、明代的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都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以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小人”其实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是党争中的政治文化符号。但小人,虽然违背了私德,但却可能体现了公德。社会要发展,必须要给“小人”以发展空间,这样国家才会更加强盛。

### [注释]

<sup>①</sup>1819年法国学者贡斯当(B.Constant)从历史角度提出

了现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性问题。在其名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将现代人的自由归结于公民独立权,而将古代人的自由归结于政治参与权。而以赛亚·伯林(I. Berli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积极自由”就是主体可以(或被允许)做某件事情的自由,“消极自由”则是主体可以(或被允许)不做某件事情的自由。“消极自由”对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是社会民主的最后底线,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襟怀和气度。

### [参考文献]

- [1]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2] 周振甫. 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 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4] 程俊英. 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5] 杨伯峻. 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 杨伯峻. 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郭庆藩. 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8] 王先慎. 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9] 荀子[M].方勇,李波,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0] 黄灵庆. 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12] 叶梦得. 避暑漫抄[M].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3]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责任编辑 李兆平]